

MAKESI ZHUYI
ZHEXUE YU
ZHONGGUO
XIANDAIHUA
YANJIU XILI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现代化研究系
列

中国 改革的 价值选择

ZHONGGUO GAIGE
DE JIAZHI XUAIZE

叶汝贤 王征国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 改革的 价值选择

◎ 陈光武著
◎ 陈光武主编

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

叶汝贤 王征国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叶汝贤,王征国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系列)

ISBN 7-306·01802-7

I . 中… II . ①叶… ②王… III . 体制改革 - 价值(哲学) - 研究 - 中国 IV .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 049859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新会市棠下中学印刷厂印刷

(新会市棠下镇)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7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系列著作

总 序

1996年，国家教委和广东省批准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的立项，在中山大学九个获准立项重点建设的学科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年来，本学科点全体教师、工作人员，团结奋战，使本学科点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条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系列著作，就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一总题目之内，包括三个子项目：由叶汝贤教授和冯平教授主持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由已故刘嵘教授和章海山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由郑永廷教授和李萍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人的现代化研究”。

上述三个子课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的探讨，是本学科点整个学科建设的重心，其他方面的建设，都是围绕这一重心展开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为了探讨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把探讨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新成果之上。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建

设的核心课题与终极目标。显然，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同样应该把研究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课题。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来自生活，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服务于生活。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把关注和改变人类的命运、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就是要关注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为哲学探讨的中心和出发点。我们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建设的任务，就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我们这个时代，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时代的内涵和特质，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主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哲学应该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我们这套系列著作以从哲学上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为中心，同时也试图为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发展哲学”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我们希望这套系列著作能够成为开启21世纪“发展哲学”研究的引玉之砖。

叶汝贤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基金资助

中山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策划：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现代化研究所
主持：叶汝贤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价值选择的涵盖	(12)
第一节 作为生活观念的价值选择	(12)
第二节 作为科学观念的价值选择	(18)
第三节 作为哲学观念的价值选择	(26)
第二章 价值选择的本质	(32)
第一节 “价值选择”概念的界说	(32)
第二节 选择的价值性	(38)
第三节 选择的自由性	(44)
第四节 选择的矛盾性	(55)
第三章 价值选择的机制	(63)
第一节 价值选择的因素	(63)
第二节 价值选择的过程	(69)
第三节 价值选择的形式	(75)
第四章 价值选择的标准	(83)
第一节 价值选择的实效性标准	(83)
第二节 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标准	(94)
第三节 价值选择的生产力标准	(105)
第五章 中国改革目标、道路及模式的选择	(119)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目标及其战略选择	(119)
第二节 中国改革的道路及其策略选择	(132)
第三节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政策选择	(143)
第六章 中国改革的价值评价	(164)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	(164)
第二节	中国改革的教训和弯路	(175)
第三节	中国改革的走向及前途	(181)
第七章	中国农村改革的价值选择	(188)
第一节	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权	(188)
第二节	产业化：农村再改革的最佳选择	(200)
第三节	农村深层改革：村级组织制度的重建	(213)
第八章	中国国企改革的价值选择	(222)
第一节	国企改革面临新的选择	(222)
第二节	选择国企改革的措施	(237)
第三节	突破国企改革的难点	(252)
第九章	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选择	(263)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264)
第二节	定位于市场机制的政府改革模式选择	(274)
第三节	定位于人才辈出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291)
第十章	中国文化价值的选择与整合	(305)
第一节	文化模式选择的一般原理	(305)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整合	(317)
第三节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330)
后记		(336)

导 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改革走过了 20 多年的历程，改革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当初所定的改革目标，多数已提前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向民主与法治的目标前进。由于这些根本性改革取得成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发展以年均增长 9% 以上的速度前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同物质文明相适应，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一句话，中国改革的成功使中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中国的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把这一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形成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的成功，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范例，表明正确的价值选择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

—

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建立在历史选择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之上，从而确保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20 多年前，“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面临着各种选择。其中的三种选择，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

其一，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路线和方针。这一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闭

关锁国，大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十年内乱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方针违反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导致生产力破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困苦的方针。这是一个亡党亡国的选择，对于人民只有负价值，已经遭到历史的否定和人民的抛弃。

其二，“全盘西化”。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成功的范式，对于落后的东方国家，无疑是一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诱惑。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最先接触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就曾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走西方之路。此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头，“西化”之声总是不绝于耳。20多年前，当中国人民从十年灾难中走出来的时候，又有人捡起这剂药方。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的决策者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剂良方。他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此作了历史的、价值的分析。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①他指出，中国一旦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大量的人们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②邓小平的结论是：“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③邓小平的分析讲明中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的道理：

一是这种选择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符合中国国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二是这种选择不符合中国十多亿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不能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全盘西化”之路走不通。

其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而作出的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俄国和中国分别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表现。俄国和中国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一个探索阶段。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由于路线上、工作上的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出现曲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发展效率不高、速度不快、人民生活仍处于贫穷的状态，社会主义并未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我们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却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优越性。究其原因，是脱离中国的国情，搞了超越中国现实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是认识上、实践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一飞跃实现了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而是最合理的选择。

二

选择了社会主义，不等于就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本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机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我们却简单地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而加以拒绝。我们选择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这一体制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生机和活力，实际上束缚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必须改革，必须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并进行第二次的选择。

这第二次选择是从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农业生产体制，从打破“大锅饭”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确定扬弃计划经济体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它。作出这一选择的根据是：

第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没有经历这一阶段。在当今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却不能跨越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方法、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对比这两种方法，市场机制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能创造经济发展的高效率。

第三，选择市场机制，不是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选择，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这就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金钱万能、道德沦丧、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所以，这一选择又是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价值选择。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三

“全盘西化”不可取，但在当今经济发展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试图“关门”搞现代化，同样化不起来。改革不能选择“西化”，但可以选择、也必须选择“化西”。

这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根本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是两个本质上对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它们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社会形态；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在世界统一体中共处。过去，只看到两者对立的一面，而不关注它们之间还有统一性的一面，没有思考资本主义还有可以利用的一面。这导致我们许多重大决策上的失误。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革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①

新生的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不能像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左派”理论家所主张的那样，破坏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从上述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必然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共产主义的预见，贯彻了这样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同时发生。因此，他们提出了继承资本主义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任务，而没有预见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产生于落后的国家并与这些文明国家共处的现象，没有预见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88页。

需要通过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可资继承，她能够接受继承的只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农民的小生产和城市手工业作坊式的工业生产力。因此，中国更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一切积极的东西，包括马克思所说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在当代主要是指管理经验、高新技术和知识）。获得这一切的途径，不是直接继承，而是通过开放，通过市场、交往和合作。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 可见，开放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具有必然性的选择，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十多亿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选择。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要不要开放，问题已基本解决。对如何开放，还需要进一步积累经验、进一步探讨。邓小平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中趋利避害。”^② 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就是价值选择。不要“封闭”要“开放”，是一种价值选择；在开放过程中，分清利害，趋利避害，同样是价值选择。打开国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在涌进积极的东西的同时，也必然会带进一些消极因素。我们必须站在中国价值观的立场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分清利害，选择、化解一切有利于我们的东西，避开、克服一切有害的东西。这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不要“西化”而要“化西”。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0 页。

四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选择，都会牵涉到一个核心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改革开放的一切方案措施，都是直接地为着解决这对矛盾，为了实现两者的高水平的统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是经常处于对立关系的两极，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效率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但这种高效率的成果的大部分却归少数特权者所有。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它只能把两者的矛盾对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强制性的统一。

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否必然就是一种协调性、真实性的统一？从理论上讲，具有这种必然性。因为，效率与公平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两者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表现。然而，这种必然性并不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必然性，而是生动的、具体的、辩证的必然性，是包涵着偶然性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具有对抗性，但它们的关系也是一种矛盾关系，它们的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在改革实践中，对这种“差别”、“矛盾”关系处理不当，也会导致它们走向对抗。这种对抗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为了取得高效率，不惜引进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式的“公平”机制，结果是一时取得高效率，却牺牲了广大劳动者的公平，造成公平与效率的对抗。另一种可能是，不关注效率的提高，把“公平”绝对化，视“公平”为一切，而对“公平”又作平均主义的解释，在实践中推行“大锅饭式”的“公平”机制，结果是导致低效率，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会造成效率与公平的对抗。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作出了第三种选择。这一选择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一，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高效率放在首位，因为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引进竞争机制，从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开始，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要时，为了换取高效率，不惜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的“倒挂”现象和剥削现象，就是一种从长远利益出发，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价值理想出发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第二，把这种“不公”、这种“代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之内，这个限度就是：一切改革，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损害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付出的“代价”不会大于“创价”等等为前提。

第三，归根到底，在改革实践中，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出发。在效率低下，效率问题很突出时，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效率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公平问题较大时，实行“保持高效率，公平与效率并举”；在不公现象严重，不公已成为阻碍效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时，应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甚至以牺牲一定效率为代价，否则也有可能出现对抗，出现破坏性的局面。邓小平就曾经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仍坚持效率优先，只是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是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的，应根据这种变动采取不同的对策。改革之初，为了打破“大锅饭”，提高效率，邓小平极力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他又反复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先富的地区，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